

洋务运动期间京师同文馆经营状况的变革

蒋智

辽宁师范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00

摘 要 : 1862年,清政府为适应对外交涉需要,正式在京城设立京师同文馆。该馆最初只是为了培养外语翻译人才而设立的临时性机构。但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发展,京师同文馆逐渐变为一所教授西方科学技术与社科法理的综合性学府,也因此成为了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新式学堂。同文馆在洋务运动期间,其课程设置、师资力量以及学生管理方面,经历了明显的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转变。这一系列的积极变革,是洋务运动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教育事业逐步走向近代化的具体写照。

关 键 词 : 同文馆; 洋务运动; 新式学堂; 近代化

The Change of the Management Status of the Beijing Academy During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Jiang Zhi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00

Abstract : In 1862,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foreign negotiation, the Qing government officially set up the Beijing Academy of Literature in the capital. The museum was originally set up as a temporary institution to train foreign language translators. However,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the Institute gradually turned into a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teaching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ocial science and law, and thus became the first truly new school in China. During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staff and student management of Tongwenguan experienced a significant change from imperfection to perfection. This series of positive changes is the result of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and also a concrete portrayal of the gradual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education cause.

Keywords : tongwen museum;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new school; modernization

清政府于1862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是近代中国所创办的最早的一所近代化学校,开创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先河。这所学校自成立至其被并入京师大学堂这40年间,无论是其课程设置、师资力量以及学生管理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革,并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翻译与外交人才。这些积极的变革,表明在洋务运动期间,中国的教育近代化事业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一、课程设置方面的变革

京师同文馆在创立初期,只被当作是一所临时性的外文翻译培训机构。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奕訢、文祥、桂良三人联名上奏希望开设同文馆以应对对外交涉事务。他们称:“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于文字语言悉能通晓,即行停止。”^[1] 据此可以得知,奕訢等人此时别说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甚至连长期学习外语的打算都没有。设立同文馆的初衷也只是为了应对与西方列强的交涉。所以在1862年正式开馆时,馆内所设置的课程只有英文课程一门。1863年4月,于康熙年间设立的俄罗斯文馆也被并入同文馆中,法文馆亦在同年开办。一直到1866年,京师同文馆的主要课程就是学习英、法、俄三国语言文字。各馆的人数也十分有限,每馆的学生人数只有10人。此外,同文馆的学生在馆内依旧要学习传统的四书五经。同文馆英、法、俄三馆均设汉文教

习,除了教授汉学,还有监视洋教习以防其在课堂上传教之意。馆内还有过规定:“汉功课仍按旧制,由学官及助教等课之,有成效者,分别奖叙。”^[2] 由此可见,早期的京师同文馆是一个出于外交实用考虑而设立的临时机构,还无法算作一个学习西学的措施。

然而,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京师同文馆的课程设置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1866年,总理衙门就提出扩大同文馆规模,增设天文、算学馆,以便为在各地设立的机器局等洋务机构提供人才。尽管遭遇了京城士大夫的强烈反对以及招生困难等一系列问题,但依旧于1867年正式开馆。而在丁韪良、李善兰等人进入同馆内担任教习之后,馆内的课程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从1871年至1896年,京师同文馆陆续设立了德文馆、格致馆、翻译处、天文台以及东文馆(即日文馆)。1876年,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为同文馆学生设立了新的课程表。新课程表在外语课程方面,设置了英、法、俄、德四种外语;在近代科学知识方面,设

置了天文、算学、物理、化学、世界历史政治、地理、万国公法以及医学等课程。同时，京师同文馆还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采取学年制与班级制授课的学校。丁韪良以学生的年龄以及是否学习外文为依据，为同文馆学生分别设立了八年制与五年制两套课程。这些课程所教授的西学程度，基本相当于从小学到中学的水平。课程设置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例如，八年制的课程如下：第一年，学习遣词造句，讲解简易书目；第二年，练习外语语法，翻译便条；第三年，阅读与讲解各国地理史略，翻译选编；第四年，学习基础数学，代数，翻译公文；第五年，学习格致，平三角，弧三角等几何原本；第六年，学习机械，微分积分与航海测算；第七年，学习万国公法，天文测算与化学；第八年，学习地理精石，天文测算与富国策（经济学）。^[9]而五年制的课程则是不学习外语与翻译，其他方面与八年制课程无大的区别。而且，新的课程设置还注重教学与实践的统一。例如，同文馆于1888年建立了一座天文台“上设仪器，顶盖四面旋转，高约五丈。凡有关天象者，教习即率馆生登之，以器窥测。”这说明当时的同文馆已经具有了实习的概念。由此可见，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发展，京师同文馆已经从过去的临时性翻译培训机构，转变成了具有长期发展规划的近代化学校。其办学理念也从被动应对西方列强，逐渐转变为主动学习近代西方科学知识。

二、师资力量方面的变革

京师同文馆初创之时，便饱受师资力量短缺的困扰。清政府原计划让上海、广州两地的官员在其管辖范围内选拔合适的人才派往京担任同文馆教习。但最终结果却是“上海虽有其人，而艺不甚精，价则过巨，未便饬令前来。”广东方面则直接声称“无人可派”。这导致原本计划于1860年开馆的同文馆迟迟不能开张。清政府只能退而求其次，接受英国公使的建议，聘请英籍传教士－包尔滕担任英文教习。而清政府聘请的法国教习，也是由法国公使推荐的荷兰籍传教士司默灵。而且，为了招揽师资，京师同文馆为馆中的洋教习开出了平均1000两白银的年薪，而汉教习平均每年只有96两白银，相差近十倍。更加糟糕的是，当时有学问的西方人，极少愿意来中国教书，清政府也没有系统的师资质量评判标准。这导致早期的同文馆不但师资人数短缺，而且质量低劣。许多洋教习不但丝毫不懂中文，甚至连一篇像样的外文文章都无法进行解读，只是为了薪资而来浑水摸鱼。这就导致早期同文馆所培养出的学生质量堪忧。例如在1866年派往中国驻英使馆担任翻译的同文馆英文馆学生张德彝，据严复所说，听力极差，连英语日常用语都经常翻译错。^[4]

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发展，加之清政府以高薪与官衔赏赐。使得越来越多学养丰厚之士逐渐进入同文馆担任教习，使得京师同文馆所培养的人才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就洋教习方面，就有如丁韪良、欧礼斐、毕利干等人。丁韪良身为同文馆的总教习，在入馆前便拥有神学硕士学位。而当他1867年被聘为国际公法教习时，还主动前往耶鲁大学进修国际法，并在获得国际法学位后再度返回同文馆任教。欧礼斐本人也拥有爱尔兰皇仁学

院的硕士学位。化学教习毕利干，来华前便有在法国一化学实验室工作过的经历，在同文馆任职期间，不但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早期的化学人才，还编写了相关的化学教材。而教授西学的教习，亦有一名中国籍人士，即晚清著名数学家李善兰。他于1868至1882年一直担任京师同文馆数学教习，并将西方先进的数学理念与教学方法引入授课之中，推动了中西方数学的交流融合。^[5]由此可见，相比创办初期，京师同文馆的师资力量有了明显的进步。而大量近代化人才的成功培养，亦能佐证其成果。从1892年到1911年，清朝总共实际派遣了54名出使大臣，其中有13名是同文馆的毕业生，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在105名记录在“同文馆校友会会员录”的学生中，进入政府机关工作的有41人；进入外交行业工作的有32人；自行创业的有10人；在教育行业工作的有5人。这些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有力证明了洋务运动期间京师同文馆师资力量的增强。^[6]

三、学生管理方面的变革

京师同文馆创立初期，对于学生管理方面的工作是极不完善的。首先，在传统的“华夷之别”观念依旧浓厚的当时，清政府不得不以巨额“膏火”来学生入馆学习。当时进入同文馆的学生，每月可领取三两银子的“膏火”。这已经达到了一个成年八旗士兵每月饷银的标准。学生若是成绩优异，还能得到最高可达15两之多的奖学金。而且同文馆学生的衣食住行，皆由朝廷出资。再加之因社会舆论阻碍，清政府不得已只能在贫苦的八旗子弟中选人。因此，早期进入同文馆的学生，多半是看在同文馆极为优厚的待遇才进馆的。1866年，而且早期的同文馆并没有明确的学制管理条例，所以便产生了许多贿赂教习以骗取膏火费的现象。而真正勤奋用功的学生，却因没有向教习行贿而无法得到奖励，这使得早期同文馆的学生质量堪忧。“开馆多年，而通晓洋文、汉文者寥寥无几，殊属有名无实。”另外，早期同文馆还存在学生在学业考试中作弊、替考之事。例如，光绪二年十二月奉堂谕便称：“风闻近来每逢月课、季考，闻有请人代作，或通融抄录，草率了卷，殊非核实之道。”^[7]

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开展，京师同文馆也逐渐开始加大力度改善学生管理工作。首先便是推广招生，同文馆原本只在八旗子弟中招收十三、四岁的少年当中招生，但这些人“于汉文义理本未贯串，若令其以洋文翻译汉文，功夫分用，速效难期；若再令讲求天文算学，更恐博而不专，迄无成就。”于是清政府便更改招生条件，从年龄为15至25岁的，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群中招揽学生。“试以策论，择其文理可观者录取，……庶可事半功倍，有裨实用”。还规定：“满汉之举贡生监，如有平日讲求天文、算学、西国语言文字，不拘年岁，准其取具印结图片，一律收考”。招生范围的放宽，使得应试人数大幅度增加。据悉，1885年同文馆的招生人数已达到了394人，比1867年招收的72人增加了近5倍。这反映出同文馆招收学生已经开始注重学生的真才实学，并且招生范围也更加广泛，而不再单纯局限于八旗子弟之中。对学生的学业考试方面，同文馆也规定：“现当岁考届期，即仿照考

试旧规，先期编立坐号，印于卷面，该生等各坐各号，不准搬移越位。是日派司官八员，会同正别提调等，轮班监场，该学生等各当恪守场规，毋得仍蹈旧习。”“嗣后无论有何考试，倘变出各生等有私挟夹带者，立即逐出场外，不准入考；再犯备罚一月膏火以示薄惩。倘于问卷后，各教习面试，而该生竟茫然不解，查出实系倩人代枪传递者，初犯罚一月膏火，再犯罚三月膏火，如仍不悛，立即除名，被枪与代枪各一律惩治等语。”另外，同文馆还基于“近来有一人兼习数艺者，难免务广而荒，且有补血洋文洋语，仅习别艺，殊失当日立馆之本意”而规定：“馆中功课以洋文洋语为要，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别艺”。由此可见，京师同文馆对学生工作的管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地走向完善与合理。^[8]

四、变革背后的所反映的进步

京师同文馆的经营状况，是伴随着晚清洋务事业的发展而改善的。同文馆经营状况的积极变革，本质上反映了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近代化观念，已经逐步影响到了近代中国的教育事业上。纵观前文，我们可以发现，同文馆对其经营方式的改革，具有以下

特点：一是学习西方天文算学以及其他科学知识；二是招收科甲正途出身的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学生。三是大量聘请洋人担任教习。这些特点实际上反映出的，是晚清官方已经开始对中西方文化进行了重新评估。尤其是，京师同文馆身处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其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整个国家与民族的态度。京师同文馆对其经营方式进行具备近代化特点的改革，实际上就等于承认：第一：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具备十分独特的文化价值，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无法与之相匹敌，值得中国学习。第二：中国固有的文化无法应对新形势下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必须对自身固有的文化进行调整改造才能求得生存。第三：中国传统的儒家士绅阶层的知识结构已经落后于时代，需要进行更新重构。第四：西方不是中国传统认知中的“蛮夷”，中国也并非是高高在上的“天朝上国”，只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分子。^[9] 京师同文馆改善经营方式，可以说是中国被迫纳入全球化范围的顺应大势之举，是洋务运动的蓬勃发展推动中国教育事业走向近代化的具体体现。同时，同文馆通过近代的教学方式，为近代中国翻译大量西方书籍，培养大量的翻译外交人才，又反过来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更加促进了古老中国向近代化的转变。

参考文献

- [1] 宝璜等编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29-35.
- [2] 丁伟志 陈松 中国近代文化思潮（上卷）中体西用之间－晚清文化思潮论述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65.
- [3] 刘萌 王曰美 京师同文馆与中国近代化教育 [J] 黑龙江史志 2021（4）48-54.
- [4] 张鸣 洋务自强 [M] 重庆出版社 2016: 27.
- [5] 陈向阳 论京师同文馆的洋教习 [J] 重庆社会科学 2007（10）78-82.
- [6] 张鸣 洋务自强 [M] 重庆出版社 2016: 27.
- [7] 余迎 论近代京师同文馆的管理弊端 [J] 兰台世界 2016.10（6）137-139.
- [8] 陈向阳 晚清京师同文馆组织研究 [M]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325.
- [9] 耿云志 熊月之 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第二卷）[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296.